

語言學論叢

第四十二輯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CSSCI 来源集刊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第四十二辑)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2010年·北京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主编：陆俭明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 | | | | |
|-----|-----|-----|-----|------|
| 贝罗贝 | 丁邦新 | 郭锡良 | 何九盈 | 何莫邪 |
| 江蓝生 | 蒋绍愚 | 鲁国尧 | 梅祖麟 | 平山久雄 |
| 裘锡圭 | 唐作藩 | 王福堂 | 王洪君 | 王士元 |
| 余霭芹 | 郑锦全 | 朱庆之 | 邹嘉彦 | |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 | | | | | |
|-----|---------|-----|-----|----------|-----|
| 陈保亚 | 董秀芳 | 耿振生 | 郭锐 | 李小凡 | 宋绍年 |
| 汪锋 | 王洪君（主任） | | 詹卫东 | 朱庆之（副主任） | |

本辑执行编辑：李小凡

执行编辑助理：李榕 艾溢芳

《语言学论丛》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 第四十二辑 /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 - 7 - 100 - 07560 - 2

I. ①语… II. ①北…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
H0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46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 言 学 论 从

ESSAYS ON LINGUISTICS

(第四十二辑)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560 - 2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7 1/2

定价：46.00 元

目 录

| | | |
|--|----------------|-------|
| 语义地图专题缘起 | 《语言学论丛》编辑部 | (1) |
| “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 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 | 张 敏 | (3) |
| 从语义地图看现代汉语“掉”类词的语义 关联和虚化轨迹 | 翁姗姗、李小凡 | (61) |
| 语义地图:理论简介与发展史述评 | 王瑞晶 | (81) |
| 语义投影连续性假说:原理和引申——兼论 定语标志的不同功能基础 | 陆丙甫、屈正林 | (112) |
| 语言和谐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 戴庆厦 | (129) |
| 语言的消亡——以新加坡潮州话为个案:兼论 基本词汇的有阶分布 | 潘秋平、何佩苓 | (137) |
| 武宁方言中的古浊声母 | 王福堂 | (179) |
| 粤语间接宾语标记的发展和相关语法现象 | 钱志安 | (189) |
| 汉语亲属关系的语义表达和句法实现 定指现象研究 | 张秀松、袁毓林、陈振宇、周强 | (211) |
| 包含处所结构的若干句式中名词强制性不 空间隐喻与“-边”、“-面”、“-头”的功能扩展——兼与 河南确山方言方位构词成分“-沿”比较 | 赵 欣 刘春卉 | (236) |
| 宾语共享类连动式的句法研究 | 彭国珍 | (275) |

2 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二辑)

- 空主语 PRO 和现代汉语控制结构 胡 波 (290)
也论无指成分 钟小勇 (308)
- 郑张尚芳与白一平离析上古韵部之比较研究
——以元部为例 王为民 (326)
试论“了”产生的历史时代及其初期语法化 李明晶 (341)
新蔡葛陵楚简“大川有济”一语试解
——兼论上古汉语中“有”的特殊用法 袁金平 (367)
- 书评:《闽北区三县市方言研究》 Zev Handel (韩哲夫) (379)
书评:《蒲溪羌语研究》 向柏霖 (Guillaume Jacques) (407)
书评:《论汉语中的台语底层》 侯兴泉 (411)
- ABSTRACTS(提要) (419)

CONTENTS

| | | |
|---|------------------------------|-------|
| Source of Semantic Map | Editrrial team | (1) |
| The Semantic Map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Multifunctional Grams in Chinese ... Zhang Min | | (3) |
| The Semantic Connection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diao (掉)-type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Map Weng Shanshan, Li Xiaofan | | (61) |
| Semantic Map: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 Wang Ruijing | (81) |
| The 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 Its Foundation and Extention —Also on Various Functions of Attributive Makers | Lu Bingfu, Qu Zhenglin | (112) |
|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on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Harmony | Dai Qingxia | (129) |
| Language Decline—A Case Study on Singapore Chaozhou Dialect and A Study of the Rank Theory in Basic Word List | Phua Chiew Pheng, Ho Pei Qin | (137) |
|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Obstruent Initials in the Wuning Dialect | Wang Futang | (179) |

- The Development of Indirect Object Marker in
Cantonese Andy C. Chin (189)
- Th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and Syntactic Realization
of Kinship in Chinese Zhang Xiusong, Yuan Yulin,
Chen Zhenyu, Zhou Qiang (211)
- On the Obligatory Nominal Indefiniteness in Sentences
Containing Locativ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 Zhao Xin (236)
- Spatial Metaphor and Function Extension of *-bian*(边),
-mian(面),*-tou*(头)—Compared with *-yan*(沿) in
Queshan Dialect Liu Chunhui (261)
- The Syntax of the Object Sharing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Peng Guozhen (275)
- On the Null Subject PRO and Chinese Control
Construction Hu Bo (290)
- Also on Nonreferential Expressions ... Zhong Xiaoyong (308)
- A Comparison of Rhyme Groups of Old Chinese by
Zhengzhang Shangfang and William H. Baxter
—The Case of *yuan*(元) Group Wang Weimin (326)
- On the Appearing Time and Early Stage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le*(了) Li Mingjing (341)
- An Interpretation of “*da chuan you jie*”(大川有济)
on Xincai Bamboo Manuscripts —And an Accessory
Discussion on the Special Usage of *you*(有)
in Old Chinese Yuan Jinping (367)

| | | |
|---|-------------------|-------|
| A Review of <i>Minbeiiqu San Xianshi Fangyan Yanjiu</i> [<i>A Study on Dialects Spoken in Three Counties or Cities of Northern Min Area</i>] | Zev Handel | (379) |
| A Review of <i>Puxi Qiangyu Yanjiu</i> [<i>A Study on Puxi Variety of Qiang</i>] | Guillaume Jacques | (407) |
| A Review of <i>Lun Hanyu Zhong de Taiyu Diceng</i> [<i>Tai Substratum in Chinese</i>] | Hou Xingquan | (411) |
| - | | - |
| ABSTRACTS | | (419) |

语义地图专题缘起

近几辑《语言学论丛》先后组编了田野调查专题、汉语词类专题和生成语法汉语研究专辑,本辑推出一组语义地图专题论文。

语义地图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2008年初,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张敏在“汉语方言处置标记的类型学地位及其他”的演讲中介绍了这一概念,立即引起了热烈反响。现代汉语、汉语史、汉语方言等不同方向的学人一致感到语义地图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随即设立了“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课题,随着课题的进展,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语义地图对汉语研究的潜在价值,为了让更多学人早日了解、掌握、使用语义地图,本辑《语言学论丛》组编了这一组专题论文。

语义地图是一种类型学研究。类型学的本质是突破单一的、静止的共时语言系统的局限,进行“跨方言,跨时代”(刘丹青,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3年第6期)的研究。类型学的基本要义,一是寻觅不同语言系统相关语言特征的时空差异,二是探求隐藏在差异后面的共性。找不到足够的语言差异,类型学就丧失了出发点;求不出差异后面的共性,类型学也就没有了归宿。关键问题是怎样寻觅差异,怎样探求共性。

寻觅语言特征的时空差异有不同的路径,一是以面带点,二是由点及面。以面带点就是利用已知的类型特征去捕捉待考察语言的相关特征及其差异,这条路径有赖于类型学的知识背景,目前可能会使不少汉语研究者望而却步。由点及面就是从能够把握的少数甚至个别语言出发去发现相关特征及其差异,然后进一步将视野扩大到更

多的语言系统,这条路径对汉语学界大多数母语研究者来说较为方便可行。语义地图走的就是后一条路径。

探求隐藏在差异后面的共性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不同语言系统相关语言特征在形式、意义、用法上都有共性存在,这些方面早已有过许多研究,但其抽象概括的程度并不尽如人意。语义地图则着眼于形式、意义、用法互相关联的层面,由此概括出来的语言共性可能反映了人类概念的某种一致性,具有更高的抽象程度和更强的普适性。

语义地图在汉语标准语法、历史语法、方言语法等研究领域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其中首推方言语法。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曾经长期滞后。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方言语法普遍只认其同而忽略其异,认为“汉语语法实际上是一致的”(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68/1979年),“至于语法,在所有汉语方言之间差别都不大”(吕叔湘,《现代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各地方言的语法差别不大”(王力,《语文现代化》第2辑,知识出版社,1980年)。80年代中期以后,在朱德熙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这种局面得以扭转,涌现了数量可观的描写和揭示方言语法差异的论著。可惜的是,面对如此丰富的差异性,有分量的方言语法比较研究却不多见,探求隐藏在差异性后面的语言共性也还没有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自觉追求。其原因之一也许是缺少适当的研究工具,我们希望语义地图能够充当这样一种工具。

本辑语义地图专题由执行编辑李小凡负责组编,共收4篇文章,着重于原理和方法的介绍,个案研究本辑暂收1篇,随后将陆续刊发。

《语言学论丛》编辑部

2010年5月1日

“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 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

张 敏

提要 “语义地图模型”是表征跨语言的语法形式-语法意义关联模式的差异与共性的一种强大的分析工具,近年来在类型学界备受关注,但尚未广泛用于汉语研究。本文以汉语的实例说明,这一工具的用途并不限于跨语言比较,它也能有效地用于单个语言的内部比较。本文倡导一种以汉语为本的语义地图研究的“自下而上”的工作模式:从单个方言的内部比较开始,逐步将比较的范围扩展到一片、一区的方言乃至全国方言,若行有余力则可进一步扩展到汉藏系语言及世界其他语言。在自下而上的每一个层面,通过比较都有机会找到蕴涵性的规律,并通过建构语义地图提出语言共性假设,同时借助语义地图获取对汉语个性更为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 语义地图模型 类型学 多功能语法形式 汉语方言语法

1 从一粒沙能否看到世界?

根据世界民族语言研究院(SIL)的认定,世界上目前有6909种活语言。其中2197种语言已有《圣经》译本,(1997年的统计)这表明语言学家至少已对两千余种世界语言作过一定程度的调查和研究。尽管这些语言千差万别,语言类型学家还是通过严格控制的抽样研究,证明马丁·裘斯(Martin Joos)的名言“语言的差异可以是无限的,而且不可预测”是过于悲观的看法。语言变异并非毫无边际,而是有一定限制的,其中既有绝对共性,也有显示变异类型所受的普遍

* 本项目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项目编号:08JJD740058)的资助。

限制的蕴涵共性。

作为个别语言的研究者,汉语语法学家的职责自然是把汉语这个特定语言的语法研究好,似乎不必顾及其他语言的情况。但汉语语法学家一向以来为自己设定的是一个相当高的目标,即不仅仅是要“将汉语语法描述清楚”,而是力求“发掘汉语语法的个性和特点”。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不得不将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及共性特征纳入考虑之中了,因为只有对“共性”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得知所发掘出来的是不是“个性和特点”。由此可见,类型学家关注的课题及其发现,对个别语言的研究者来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问题是,很难苛求汉语研究者像类型学家那样把世界语言抽样研究一番,再来谈汉语。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提出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问题,即是否有某种方法能帮助我们通过对单个语言(譬如汉语)的深入研究,从中不仅能看到个别语言的属性,也能看出语言共性,一如汉语成语“见微知著、因小见大”,佛家智慧中的“一花一世界”及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名句“从一粒沙看世界”所言。其实语言学家对这一想法并不陌生。生成语法早就提出过从一种语言的深入研究中发掘语言共性(即普遍语法)的思路,只不过这种共性包含有较多的抽象分析,而功能类型学所说的共性是从大量语言的比较中得出的、含有较少抽象分析的经验性规律。本文所说的“共性”指的是后者。

若一个语言是一粒沙,那么汉语就是由将近七千粒沙构成的沙海中的一粒。本文力图说明,功能类型学界近年来提出的“语义地图模型”(the Semantic Map Model),完全可以转化为不必、不愿或因条件限制而无法进行大规模跨语言比较研究的个别语言的研究者发掘语言共性,并在其基础上更深刻地认识语言个性的一种使用起来极为方便的研究工具。换言之,从我们最熟悉的汉语这粒沙里有机会看到世界(即共性),由此反观汉语,对其个性的认识自然也会更加准确和深刻。

严格地说,功能类型学并不主张“从一粒沙看世界”,这是由其作

为一门经验性的比较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如科姆里(1989)所说,“要有相当的把握证实某一语言共性,事实上必须掌握广泛语言的数据”,“有些语言共性根据一种语言根本无法预言。具体地说,蕴涵共性就属于这一类”。不过,科姆里(1989)在论及“单靠任何一种语言不能为设定的蕴涵共性提供所需要的那类证据”时有一个“但书”,即“唯一的例外是,某一种语言在某一领域内有不止一种结构,在这种情形里或许有可能根据同一语言内部两种结构式的数据建立蕴涵关系”。作者所举的例证是关系化的可及性序列(accessibility hierarchy),即“主语>直接宾语>非直接宾语>领属成分”这一蕴涵关系。可及性序列是从跨语言比较中归纳得出的,但它可以部分地由单个语言的资料推出,条件是该语言有多于一种的关系化手段。例如包括汉语在内的不少语言都有两种关系化手段,即不太明确的“空缺型”手段和较为明确的“代词保留型”手段。在汉语里,用“空缺型”手段只能将可及性序列中较高的部分关系化,即主语(如“ \emptyset_i 打犯人的那个警察_i”)和直接宾语(如“警察打 \emptyset_i 的那个犯人_i”);序列中较低的部分“空缺型”已无能为力,这时可用较为明确的代词保留型手段(如非直接宾语“我给他_i理过发的那个老人_i”、领属成分“他的哥哥打过我的那个人_i”)。因此,单凭汉语的内部证据就可以推出上述序列的一部分,即“主语、直接宾语>非直接宾语、领属成分”。这个例子显示,通过比较,无论是跨语言的比较还是语言内的比较,是有可能发现蕴涵关系的。类型学家不从单个语言的内部比较发掘共性,当然主要是由其工作性质决定的,同时也是因为跨语言比较所能提供的差异性资料远较单个语言丰富。还是以关系化为例:有些语言只能将主语关系化(如马尔加什语),有些可将主语和直接宾语关系化(如汉语),有些可将主语、直接宾语及非直接宾语关系化(如北弗里西亚语),有些可在所有四个位置上构成关系小句(如英语),根据这些跨语言资料不难归纳出上述序列。假如某个语言有四种不同的关系化手段,其作用范围彼此互补或部分叠合,那么基于这样的内部比较或许同样能归纳出“主语>直接宾语>非直接宾语>领属成分”

这一完整的序列。问题是这样的语言并不存在,单个语言最多只有上述两种关系化手段,也就是说,没有足够丰富的差异性资料可据以构建出完整的蕴涵序列。

由科姆里(1989)提到的各种无法或难以根据单个语言得出的蕴涵共性例证看,其对象都是形式类(如前置词、后置词等)或结构特性(如语序)。“语义地图模型”的研究对象则明显不同。顾名思义,其着眼点是“语义”,研究的是不同语法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些关联可通过对表义功能相互交叉、部分叠合的不同语法形式的比较而窥知,无论这些形式是来自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当然,语义地图模型既然是由类型学家提出的,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跨语言比较的工具。但和前述形式类、结构特性不同的是,表义功能部分交叉、叠合的语法形式在单个语言里往往是广泛存在的。随便翻开一部较详细的单个语言的虚词词典,往往可以看到大量“辨析、比较”的条目,这就是明证:用法完全相同的虚词无需辨析,用法完全不同、义项互无交叉的虚词也没有辨析的必要。也就是说,单个语言里也存在着足够多的差异性资料可据以进行内部比较,从中发现蕴涵性的关联。实践证明,以这种方式发掘出来的蕴涵性关联,在引入更多不同方言、不同语言的语料之后,一般仅需作局部的修改,少见需全盘推翻的情况。换言之,从单个语言的差异性数据中完全可以提出有关蕴涵共性的工作假设。这正是语义地图模型对个别语言研究者来说独具魅力之所在:一粒沙子里确实有机会看到世界。

如上所述,类型学研究所必需的差异性资料可以在单个汉语变体(如普通话、某个方言或某个历史变体如上古汉语)里求得,而不同汉语变体之间的比较自然会给我们带来更为丰富的差异性数据。汉语方言之间差异甚大,以至于海外语言学界往往将汉语方言称为“汉语族语言”(the Sinitic languages)。汉语有三千年不间断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同时期的汉语也有一定的差异。对汉语的时间变体(历代汉语)和空间变体(方言)里的差异进行比较,其实已无异于跨语言比较,这也是语义地图模型这一跨语言比较研究工具适宜于在汉语

研究中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换言之,在汉语研究中通过语义地图模型“从一粒沙看世界”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这粒沙虽小犹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息”(holographic)的性质。

2 语义地图模型概述

2.1 研究对象:“多功能语法形式”

语义地图模型的研究对象,通俗地说,乃是语法领域里的“同形多义”。具有这一特征的语法形式在类型学界一般被称作“多功能语法形式”(multifunctional grams),其中的“功能”指的是表义功能或曰表达作用,不是语法分布,亦可译作“用途、用法”或“语法意义、语法功用”等。具有两个或以上意义/用法/功能的语法形式主要包括虚词(功能词)和语法构造两大类。虚词一般来自实词,其语法化往往会造成复杂的链条,故常用虚词一般都具有相互关联的多种用途和功能。例如,上古汉语的介词“于/於”可引介处所、来源、时间、比较对象、受益者、施事等多种题元角色;现代汉语的副词“还”能表示追加增补、仍然、递进等含义;语气词“呢”能在疑问句、感叹句句末承载语气意义,也能在陈述句句中充任话题标记;不少汉语方言(尤其是东南方言及南方官话)里来自给予动词的虚词可引出接受者、动作对象、受益者、使役者、被动句施事,处置式受事等角色。和虚词一样,作为语法形式的句法格式,其常用者(如双宾式、处置式、重叠式、动补结构等)也常常负载多种相关的格式意义。例如北京话的双宾结构可负载的格式意义包括:(1)给予(“给我一本书”), (2)取得(“偷了他一本书”), (3)外位领有者受损(“打断他一只胳膊”), (4)信息转移(“教他数学、告诉你一件事”),等等。赣语安义话的双宾结构有(2)(4),无(1)。上古汉语的双宾结构有(1)(3),无(2),等等。这些都是上文所说的可用于比较的“差异性资料”。

多功能语法形式的研究绝非新课题,在过往的语法研究中,无论

形式学派、功能学派,共时语法、历时语法(尤其是语法化研究),均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尽管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小的改进空间。首先是汉语方言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不同意义/用法/功能的关联模式尚未得到全面、准确的描述,而对已知的关联模式的解释也常常是各执一端,众说纷纭。例如来自给予动词的诸多虚词用法之间的关联,不同学者分别提出处置式、被动式标记具有内在关系(基于施受同辞),处置式标记直接来自给予动词,被动式标记来自受益者标记,被动式标记来自使役标记等许多种不同说法。又如双宾结构能负载多种格式意义(给予、获取、信息传递等),其间的关系也有诸多说法,如有人认为给予类是基本的,其他引申自给予类的原型;也有人认为更基本的原型应是获取类,等等。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要取得更大的进展,有赖于新材料的搜集和新方法的引入。

语义地图模型正是这样的一种新方法。先看汉语方言里多功能虚词的一个较极端的例子,即与给予动词同形的虚词。在徐州话(中原官话)里,词形“[ke⁵⁵] (给)”除了用作给予动词(如“给我一本书”)之外,还另有九种用法,即:(a) 使役标记:“给看不给看?”,(b) 被动标记:“小鱼儿给猫偷吃了”,(c) 处置式标记:“给窗户开开!”,(d) 接受者标记:“寄给他”,(e) 受益者标记:“给我办事”,(f) 伴随格标记:“给我一起去!”,(g) 并列连词:“小李给小王”,(h) 处所标记:“给河那涯儿玩儿来”,(i) 来源标记:“给这儿往南走”。其中当然不排除偶然同音的情况(如笔者怀疑最后四种用法是一组,其来历与前五种可能不同),但不大可能都是偶然同音的同形词,证据是其中不少用法在其他方言或语言里也颇有用同一个形式负载的例子,甚至也能找到用同一形式负载上述全部九种用法的方言,如浙江余姚(宁波)话的“[teP⁵⁵] 得”就是如此。既然至少部分用法是有内在关联的,那么,若仅凭徐州话的“[ke⁵⁵] (给)”或余姚话的“[teP⁵⁵] 得”是难以确知其关联模式的。现在作进一步的比较。首先,徐州话的内部比较也极有价值,因为徐州话还有其他一些虚词亦可兼用上述九种用法中的某几种,如“[kə²¹³] 搞”可兼表(h) 和(i), “[tɕiɔ̃⁵¹] 叫”可兼表